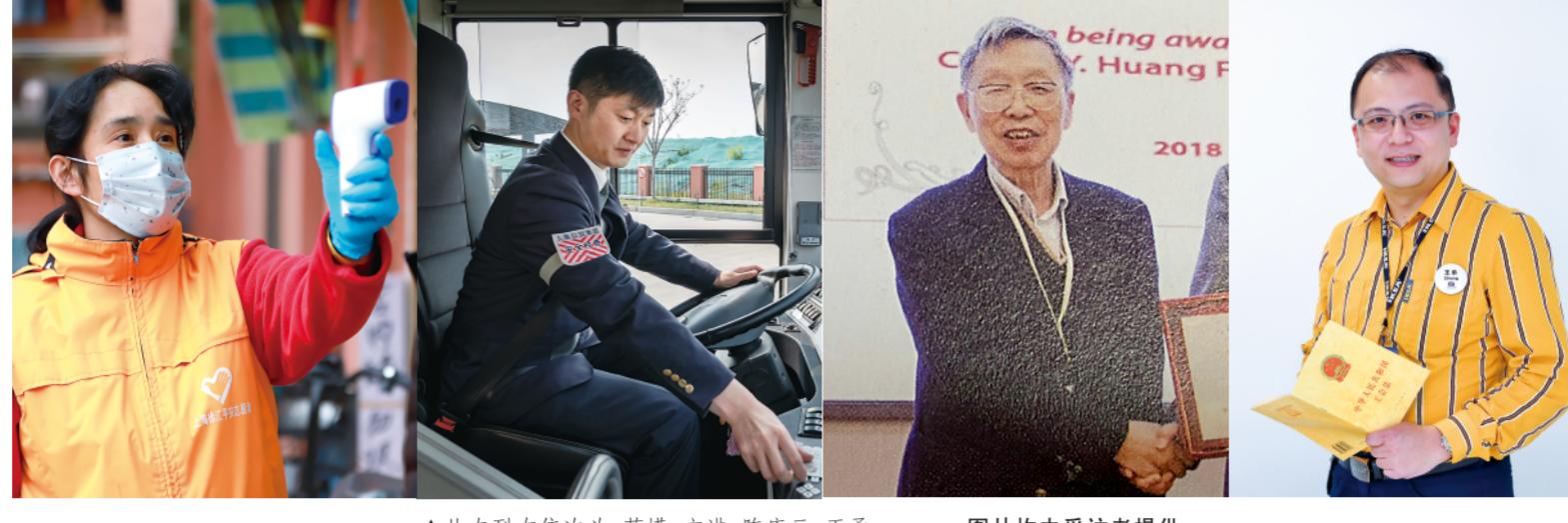


上海：“楷模社区”里的三代劳模故事

位于上海市徐汇区的田林街道，是个生活和工作着10余万人的社区，有退休和在职的劳模及先进工作者130余名，其中在职全国劳模10名，市级劳模41名，他们最大的91岁，最年轻的才33岁。让一位劳模成立一间工作室，带动一方社区、一家企业、一车乘客……最终形成一支榜样队伍；街道以党建引领、劳模示范，全方位打造先进服务阵地图、资源区域图和联动共建图，一个“楷模社区”是这样干出来的。



▲从左到右依次为：苏嵘、方进、陈庆云、王承。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本报记者周琳

“70后”苏嵘：她是社区女版“李云龙”

在京参加表彰大会回沪是晚上，家人早已呼呼大睡。“在他们看来，我都能当劳模，全世界就都是劳模了！”苏嵘哈哈大笑了起来，又放低声音偷偷说，“别看我在社区跑得欢，在家里我可会偷懒了。”

1972年出生的苏嵘是田林街道长春居民区党总支书记，在基层做社工已经18年，因为脾气爽朗，被居民亲切地称为“苏大侠”。

“我运气好，硬骨头总是被我啃。”徐汇区的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恰出现在苏嵘负责的小区，这是上海最早的确诊病例之一，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。

那会儿各类防疫物资已经非常紧张，学医出身的苏嵘，从家里拿了两件雨披，戴着口罩，带上消毒水，就去帮这家人收垃圾，然后骑着助动车风风火火就冲到医院给病患送物资。结果，放下“物资”刚离开的苏嵘就接到了病患的电话：原来“一顿操作猛如虎”的她，把垃圾放在了医院，把物资又带了回来。

刚开始确实有些惊慌，但“苏大侠”很快镇定下来，“经历过非典和禽流感，谁还没个半桶水？”

回来后，她第一时间给社区所有居委干部打了电话——“都回来！党员和男人先上，但我是第一梯队小队长。我倒下了，你们都是第二梯队队长！”

一场轰轰烈烈的社区防疫战就此打响，苏嵘100多天基本没有休过假。这位从小在西北长大，20多岁来到上海，说话嗓门大、音调高，做事雷厉风行的女书记，展现出了自己细腻的一面。

患者家属自己带着孩子居家隔离，苏嵘判断出其心里一定很紧张。她用自创的社区工作“土办法”安慰家属——“每天晚上，我都打电话唱歌给对方听，不管我唱得好不好，先听了再说嘛。”

最初苏嵘唱的是沪剧经典选段《为你打开一扇窗》和讲述红军的《四渡赤水出奇兵》，唱到“横断山，路险风行”的歌词，苏嵘一想不对，这不是加重心理负担吗？她立马又换成了网络上最流行的《左手手指》《火红的萨日朗》，还给孩子唱起了《蓝精灵》。苏嵘煞有介事地命名，这叫“心理慰藉法”。

给患者家属送物资，她说自己就像一个“小偷”一样，弯着腰悄悄地爬上楼，“想保护他们的隐私，他们心理压力其实非常大，而且也不想给其他居民们造成恐慌。”

一开始有社区干部有畏难情绪，不愿意帮忙参加社区的消毒工作。苏嵘没有单刀直入做思想教育工作，相反，每次消毒时，她不仅自己冲在第一线，还鼓励社区干部和社区里各处盛开的花朵“自拍”，还把照片天天发在了工作群里。一方面，让所有居民都能看到，居委干部一直都在；另一方面，那些从来没有“自拍照”的社区干部，后来也红着脸要求加入队伍。

“这叫欲擒故纵。”苏嵘说。

后来，不管哪个居委有疑问，都第一个给苏嵘打电话。一次，隔壁居委也发现一位确诊病例，苏嵘来到医院看到社区工作人员要进病房，防护设备却一般，就拿了个马甲袋套在了对方头上。“没问题，随时随刻，我就是你们的12345。”苏嵘说。

经历了数个小区工作的苏嵘，在当地干部群众看来，特别善于“处理矛盾”。而苏嵘的秘诀就是：只要能给居民做事，任何人她都可以去“理论理论”。

2004年以来，苏嵘先后担任了5个居民区的党总支书记，每个都是矛盾较多的“硬骨头”。有个小区路面因先期设计缺陷，年久失修致使主干道坑坑洼洼，物业和业委会因此矛盾重重。居委、物业、业委会俗称为居民区里的“三驾马车”，三匹马

（上接13版）“罗日盖是我们牧民群众的好朋友，大家见到他来，就像见到了希望，非常欢迎。”满掌乡党委书记尕藏当智说，大家都知道，这片黑土地的变化，离不开罗日盖的辛勤付出。

1981年参加工作以来，罗日盖平均每年在野外工作超过200天。日复一日的野外作业，他几乎用脚步丈量了达日县的每一寸土地，到访过每一个户人家。

“哪里退，哪里补。”每年冬天，罗日盖奔波在草原深处，挨家挨户询问每户牧民家具体情况，实地查看黑土地，选择确定来年春天播种草籽的地方。连续奔波在达日县草原沟壑，几乎全年无休。

“罗站长丰富的种草知识，都是靠跑出来的。”达日县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赵恩来说，他没怎么读过书，“全靠一双腿，一步一步走出了达日草原的今天。”

夏日阳光灼得人睁不开眼，冬天狂风打得脸皮割般疼……草原上危险艰辛、各种意外，对罗日盖而言早已是家常便饭。

2002年2月，刚结束满掌乡鼠害调研的罗日盖，和一名专家驱车返回县城。白茫茫的积雪将土路盖得严严实实，在一处急弯处，汽车打不动方向，直接冲撞到草地上，车辆前盖破裂，保险杠脱落。

“我是牧民的孩子。”罗日盖说，“通过我们这代

他治好了黄河源区近80万亩“草原之癌”

凭借着丰富经验，罗日盖稳妥安置后，冷静地开车驶回道路。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他说，常年在草原上，多少会遇到各种突发意外情况，“人没了不要紧，草还在就行。”

“哪里有黑土地，哪里就有罗日盖的身影。”40年来，罗日盖走遍了达日县33个行政村的沟沟壑壑。哪座山上住着几户人家，哪条沟里有多少黑土地，谁家牧场需要种草，他心里装着一本账。

索南昂毛和罗日盖共事7年来，下乡从不带地图，不开导航，“因为罗站能精准知道每家牧户住在哪条沟，他是草原上的‘活地图’。”

保护生态、守护家园。达日县委书记牛得海介绍，通过实施三江源生态保护，以及退牧还草、生态修复等治理项目，近年来达日县草地植被覆盖度从46.7%提高到57.28%，天然草地鲜草平均亩产量由原来的115千克，提高到现在的150千克，“罗日盖就是扎根在达日草原上的旗帜”。

“我是牧民的孩子。”罗日盖说，“通过我们这代

人努力，让草原重焕生机，让黄河重漾清波，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绿色草原，这一辈子，才算没白过！”

坚守草原

“变回更多绿草原和金草原”

由于腿疾，罗日盖在平地上走路一瘸一拐，可在海拔超过4200米的草原，上山爬坡时，谁也追不上。罗日盖的一生，注定离不开这片茫茫草场。

40年来，和罗日盖同龄的同事相继退休，只有他还在坚守，因为他离不开草原，草原也离不开他。

很多省级单位希望他早点退休，到条件更好的机构搞科研。可他依旧春治鼠害，夏种草籽，秋季验收，冬测草场，“一年下来时间刚够用，必须把工作干在大地上”。

日积月累的压力和辛劳透支着罗日盖的身体。长期坚守在高原工作，使他患上高血压、白内障等典型“高原病”。身边同事劝他多回家休息，他

却说：“时间不等人，达日县的黑土地治理，不能拖后腿”。

达日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李有福说，大家怕罗日盖退休，草原上需要这样一个熟悉每一寸草场、每一户人家的“草原专家”，“又怕他继续这么奔波，万一哪一天再犯心梗，倒在草滩上，达日县草原可就没了半边天”。

2016年10月，结束野外作业的罗日盖，突然呼吸困难，犹如大石压在胸口。连夜送医确诊为心梗后，第二天他便被紧急送到西宁，接受心脏搭桥手术。

转诊路上，汽车碾过碎石，陷入泥坑。颠簸中，意识不清的罗日盖还在念叨：“10月有草场验收，11月要测黑土地”。

经过抢救，转危为安后，罗日盖在病床上躺了不到两周，就背起帐篷，换上冲锋衣，重返草场。

“这是阿克（叔叔）这么多年来的，休息时间最长的一次。”达日县草原站干事苏尼么措说，大

越来越觉得自己是社区的一部分，积极参与到社区的各种综合治理工作中。

在街道的支持下，王承组织挑选了几位熟悉宜家产品的同事，一个居委一个居委地走访、测量，了解社区工作的需要，匹配适合社区的设计风格、价位。田林街道的一些邻里小汇、党建服务站、居民区活动室，有了全新的公共“客厅”设计，打破了原有行政化的模式，用开放、互动的方式，打造了一个“家外之家”。

“宜家的愿景一直是：为大众创造更加美好的日常生活，我们希望企业愿景能和实实在在的社会服务结合在一起，让外资企业和社区深度融合起来、共同发展、共建共享。”王承说。

“90后”陈庆云：70年只爱一种化学元素

在田林十村一栋老房子的顶层，一对老夫妻的房子尤为安静，他们很少出来遛弯，屋子里也鲜有声响。邻居们并不知道，这里住的陈庆云院士是我国有机氟化学领域的创始人之一。

陈老今年已经91岁了，却依然每周二、四五的上午到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上班，带博士、硕士，做课题，看文献，帮助学生修改开题报告，全程参加组会。其余大部分时间，他就安静地待在房间研读氟化学方面的文献，从20多岁到如今，陈老已经坚持氟化学研究近70年。

1956年，陈庆云前往莫斯科留学，攻读副博士学位。在没有进入实验室前，老师一对一教他俄文。那会儿正好赶上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，跟老师学的第一个词就是“人造卫星”。

“那时我就感到，国家实力和科技创新密切关联，科技创新又离不开基础研究。”陈庆云说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“两弹一星”工程所需新型化工材料——氟橡胶，可以用于航空、导弹、火箭等尖端技术和仪器、机械等工业领域，美国杜邦1948年就已成功实现商业化生产，但对中国一直进行封锁。

回国后，陈庆云所负责的，就是氟橡胶中一个成分的获取方法。那时，这一成分需要电解制作，费劲费力气。在陈庆云和团队的不懈努力下，两三年后找到了新办法。直到今天，全世界都在使用这一新方法进行合成。

尽管科研成果已经从实验室走到了工厂，但陈老依然时常谈起自己的两大遗憾：一是理论方面的储备不够，如果再上一次大学，一定把物理和数学等基础学科学得再深一点；二是应用方面做得还不够。

在他看来，基础研究的“最先一公里”很重要，有效衔接成果转化、市场应用的“最后一公里”同等重要。数十年来，他一直和自己的学生强调，“终究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东西才可以”。

“我到杜邦去参观，夸他们干得好，他们说我们老板有钱，挣来的钱不是满足于今年赚钱、明年赚钱，而是投入下去，十年以后赚大钱。所以杜邦厉害啊，不赚小钱。”陈庆云说，我们现在基础研究走向工厂应用，中间还有很多阻碍要突破。这些困难，是每一个科研人都需要去攻克的。”

2017年，一位爱尔兰化学家在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，详细介绍陈老开发的一种化学试剂“陈试剂”的研究和应用情况，作者认为这一有效的试剂没能得到充分利用，希望通过评述让更多读者注意到。

看到文章，陈老不仅没有因为自己的研究被国际同行关注而高兴，反而忧心忡忡，“文章说‘陈试剂’是被遗忘了的试剂，从一个侧面反映的是，从基础研究走向工厂应用，中间还有很多阻碍要突破。这些困难，是每一个科研人都需要去攻克的。”

在陈老和团长长达70年的持续努力下，到本世纪初，国外的同行给了上海研究“氟”的团队一个特别的称号——“上海氟化学”。只要是这一领域的同行，都知道这支力量强悍的研究团队。

“我们做学术研究有三个‘金标准’：The first，你第一个发现的；The most，你做得最多；The best，你做得最好。”陈庆云说，团队中所有人都用这个“金标准”来要求自己。“最终，不看头衔、不求表彰，看的是有没有做原创性引领性的工作，在中国形成一个点一条线，甚至一个面，最终带动一个群体。”

陈庆云虽已退休多年，依然坚持参加各类型学术会议，阅读最新的学术文献。在他的学生看来，陈老似乎是一个阅读量巨大的“百科全书”，当学生遇到问题时，陈老可以一口说出哪个最新文献是和这个问题相关的。

“如果我一个星期没看文献，就会心里发慌。那么多新材料，就算不睡觉我也看不完啊！人活着就是要渴望新的知识，不然就没意思了。”陈庆云说。

家提醒他注意身体，他总说“只要还有黑土地，我就坐不住。”

罗日盖常说：“草原上的人没有家。”家里修新房子，妻子好不容易联系上他，“能不能回来看看下咱家房子？”然而新房修完了，也没等到罗日盖回家的身影。

从小到大，四个女儿的家长会，罗日盖一次没去过。如今，在外地上学的女儿，回家想见父亲，也只能“碰运气”。

“草原就是父亲的家，我们一家人都会支持他。”罗日盖小女儿依吉说，每次坐车回家时，看到路边一片片绿意盎然的草原时，心里就会油然而生自豪感，“这背后是父亲的心血、骄傲”。

“罗日盖就像大草原上一棵小牧草。”青海省生态环境厅厅长张世华说，他40年如一日，无怨无悔地扎根在草原，在一片片黑土地上培育出一绺绺嫩绿的牧草，默默无闻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。

望着黄河两岸，漫漫草场上牛羊成群，罗日盖露出不尽深情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只要还活着，我就要在草原上，让更多黑土地、变成保护生态的绿草原、牧民致富的金草原。”